

安全也是硬道理

——国家经济安全透视

江涌 著

安全与发展：国家治理之一体两翼
安全规定着发展的边线、底线与红线

 人民出版社

安全也是硬道理

——国家经济安全透视

江涌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寅

封面设计:胡欣欣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全也是硬道理:国家经济安全透视/江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01-014215-9

I. ①安… II. ①江… III. ①经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F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113 号



安全也是硬道理

ANQUAN YESHI YINGDAOLI

——国家经济安全透视

江 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18 千字

ISBN 978-7-01-014215-9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安全也是硬道理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进行曲”以危机开始（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与“9·11”恐怖袭击），最后又以危机结束（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世人对经济增长、生活改善、社会繁荣之憧憬，犹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转瞬间就破灭了。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人们期盼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但是中东大动荡与日本大地震接踵而至，冲击着国际社会尚抱一丝希望的幼芽。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如此令大小不一、强弱不等的主权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

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动荡与危机

令世界多国陷入越来越深的安全困境，主要不再是传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对抗，而是金融风险、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传染疾病、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一系列越来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参合下，在别有用心分子的搅和下，在预期效应、羊群效应的作用下，演变成为复合型危机，如此令习惯以维护国防安全、政治安全为要职的主权国家政府疲于应对。

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彼此难有明确的界限。在国内，若经济长期迟滞、社会矛盾激化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军事冲

突，最终威胁国家安全。在国际，军事安全问题会直接带来非军事安全问题。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使用贫铀弹，都导致了严重的生态与人类灾难。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也会直接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诉诸武力和战争。例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恶斗、苏丹达尔富尔的部落冲突等主要是对水资源争夺的结果。以非传统手段追求传统安全目标的，在国家博弈中越来越明显，美国即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战争。转基因食品、流感疫苗等生物技术的使用，本身只是一类非传统问题，但别有用心者也可以将其当作生化武器，通过隐蔽的非军事手段，达到军事手段同样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因为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因复杂多变，如此才使得主权国家的安全困境不断加剧。

信息化乱了时空。现代通讯、传媒、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爆炸，泛滥成灾。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信息流通的泛滥，使信息安全的攻防成本严重不对称，黑客可以利用极小的成本（如一台价值几百元的电脑）、极隐蔽的手段（如任何一个网吧），即可发动攻击。一个普通网民，通过散布“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谩骂，即可参与制造或引发“网络洪流”“信息海啸”，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别有用心者抑或国际强权，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恶意制造或有选择发布信息，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达到错乱思想、引发社会动荡、颠覆政权的目的。金融大鳄利用全球化与信息化，于斗室之中，键盘敲击之间，即可让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价格潮涨潮落，甚至掀起金融危机，以浑水摸鱼，趁火打劫。

全球化乱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将机会撒播到世界，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依据自身优势，克服先天不足，程度不一参与国际分工，由此脱离了贫困，部分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全球化也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魔鬼，将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弱势群体拖入“撒旦的磨坊”。全球化使国际分工愈加细密，国际市场联成网络。然而，分工越细密，网络越宽广，节点越多，也就越脆弱，越容易崩溃，而且“一毁俱毁”。在全球化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四处流动，时时流动。国家间用签证制度管理人流，用海关制度管理物流，然而对于资金流，对于越来越快、越来越

越大的信息流，国际社会迄今尚无基本的应对共识。

金融化乱了市场。金融原本职能就是融通闲散资金，集中信贷投放，增加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率。曾几何时，金融出现了异化，从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的成长中分享合适收益，部分蜕变为统治、驾驭实体经济，以钱生钱。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置人类道德与良知于不顾，吸食各类优质资源从事欺诈性“金融创新”，推出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金融衍生品，操纵市场，翻云覆雨，使竞争、供求、价格等市场机制全盘失灵。国民经济在金融化、杠杆化过程中，不断虚拟化、泡沫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以金融危机呈现出来。

自由化乱了思想。自由化是共同体的大敌，自由化会强化个人主义，否定集体主义，鼓励自私自利，侵蚀共同价值，最终会瓦解共同体，出现国家认同危机。新自由主义原本只是一类思想流派，但是被金融利益集团与强权国家操纵，包装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与经济定理，在世界流传。在特定时空中，经济自由可能会带来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但是，在丛林法则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自由是特定群体的自由，是经济人的自由，是强者的自由。经过新自由主义思想清洗的人士，很容易将西方的强权“内化”为自己的使命；接受了所谓“普世价值”的人士，也很容易将自己“升华”为“国际主义者”。

两极化乱了基础。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一端，积累着富裕与繁荣；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一端，则积累着贫困与动荡。酒肉臭与冻死骨并存，营养过剩的减肥与挨饿导致的营养不良同在。富裕的孤岛为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世界在加剧失衡，国际在加剧动荡，全球在加剧不安全。少数霸权、强权越来越多地借助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掠夺弱小国家与弱势群体、中等国家与中产阶层，成为世界的寄生者。一些遭遇“资源魔咒”的国家和地区、一些挣扎于贫困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些被世界发展与繁荣边缘化乃至绝缘化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海盗、恐怖分子的渊薮与温床，整个世界由此失去了稳定的基础。

紧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是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等系列金融危机，危机加速国际力量失衡、格

局变迁、秩序调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步入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的时代。西方主导、美国“说了算”的时代正走向终结。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日趋脆弱，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的时代，给那些“利用和平，实现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

发展的“硬”道理正越来越“软”

正是认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才把战略重心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上来。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出了一句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影响深远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后，新一轮更加迅猛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大潮在中华大地涌起。

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发展，都依赖发展，所以对于中国，不仅是过去、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都将是硬道理。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党的十八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犹如鹰击长空傲视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观被一部分人在执行中扭曲，导致我们在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发展理念的创新上、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发展难题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一系列不如人意的后果，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来越“软”。

发展内涵。长期以来，我们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被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被理解演绎

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提高。经济规律替代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成为“万能规律”。“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出现了‘唯GDP（国内生产总值）’、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讨好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的“寻底竞赛”——“比谁更贱”——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还有廉价政策——内外有别的各类税收减免与待遇优惠。

大众则在政府追求GDP的示范下，为赚钱而奔走。赚钱的多少，似乎成了个人事业成功的唯一标准。孔子教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今社会，不管正道偏道，还是歪门邪道，似乎赚到钱就是成功之道。孟子告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当今社会，不管大利小利，还是不义之利，似乎争到手的就是“大吉大利”。

发展道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如此评论：“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②市场具有明显而强烈的两重性，即一面作为“财富的魔法师”，而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作为“财富的魔法师”，市场将财富迅速地、近乎无穷无尽地“从地底下呼唤出来”。而作为“撒旦的磨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等等美好，都会被无序市场卷入磨坊碾个粉碎。环视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但见识了“财富的魔法师”的无边法力，更目睹了“撒旦的磨坊”的离奇功能。其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就包括“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③

发展理念。长期以来，西方不断宣扬自己光彩照人的修饰文明，而竭力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② 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大转型》一书所作的序言，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4页。

隐藏自己的真实历史，例如，国家公然充当海盗、贩卖毒品、大规模屠杀土著居民、发动一个又一个侵略战争、肆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制造资产泡沫大要金融骗局等等斑斑劣迹。一些西方大国甚至还不断在教科书中“创造”历史，编制一个个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当作“致富的梯子”兜售给发展中国家，这些诸如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尊重知识产权等“成功经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护市场、限制海运、抛弃知识产权等）却被它们故意踢开。^① 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按图索骥后陷入了经济混乱、社会混乱与政治混乱，甚至落下“失败国家”的恶名。

近代以来，中国有长期落后于西方而被动挨打的痛苦经历，所以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精英负笈担簦，远涉重洋，到西方求取民族复兴秘籍。然而，近一百七十年来，中国面向西方学习的莘莘学子，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并非都能用“积极”加以概括。他们当中，有“玄奘西游”，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的知识理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给国家民族添加正能量。然而，也有“蒋干盗书”，即把西方推荐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当作真经引进并加以学习模仿。留学归来的学子当中，不乏把糟粕当精华加以学习模仿之人；甚至给西方当起了鼯鼠、第五纵队、经济杀手，损害国家与民族利益。近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些复杂的“西天取经者”没有认真甄别，认为“学成归来”的都真才实学，真材实料，真心实意为民族复兴献一腔热血。拿出大笔银子吸引海归人才。想一想，当初，为“两弹一星”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是为“稻粱谋”而回国效力的？今天，那些高薪聘请的海归，到底有多少人实现了预期重大科技突破？对他们的不恰当对待，又扼杀了多少本土人才？

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法学和新闻学领

^①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如此表述：“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域，莫名其妙用高薪引进一些挖自己墙脚的“人才”。

发展成果。邓小平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①

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必然一端是贫困的积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利益均享，才需要改革，才需要壮士断腕。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两大著名模式：一个是走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另一个是搞个体经济的“温州模式”。如今都淡出了人们视野。实际上，让“温州模式”进化到“苏南模式”，即个人先富上升到共同富裕，需要百倍艰辛努力；而让“苏南模式”滑落为“温州模式”，化公为私，甚或损公肥私，只需要放任自由即可，地球引力自然向下牵引，泯灭仁爱良心，释出贪婪心魔，放任道德堕落，自然即可实现。

在西方，那些被称为“强盗贵族”的少数一族，都是近乎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今日的显赫。然而，今日中国，那些“土豪”们，仅仅十多年，多不过二十年的“辛苦”，别墅、豪车、游船、飞机……这些西方富豪所拥有的，中国“土豪”一应俱全。西方富豪没有的，如小三小四，中国土豪照样有。中国“土豪”的“中国梦”早就不做了，而是在“公知”的捣鼓下，努力地做“美国梦”了。有道是，奔向地狱之门，不仅是那些姗姗落伍者，也有所谓捷足先登的人。“美国梦”已破碎，美国霸权的历史正在终结。与此同时，穷二代、农二代、蚁族等一直在为就业生计而犯愁忙碌的“弱势一族”，他们的“中国梦”又在哪里？

安全的“软”道理正越来越“硬”

几十年来，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且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谋发展。然而，中国越是发展，体量块头越巨大，周边国家反应越敏感；越是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展，利益边界越大，要守护的利益越多；越是发展，利益分配一旦不均，不满情绪越是严重……总而言之，越是发展，境内境外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越多，安全困境就越大。

军事安全不容乐观。冷战开启后，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与冲突似乎渐行渐远，但是一些强权通过代理人或唆使一些附庸国利用地缘政治矛盾而不时挑起事端。21世纪初的“9·11”事件，搅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这个没有帝国之名的帝国挟冷战胜利之余威，以“反恐”的名义将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变相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大大消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硬软实力。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爆发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发生着历史性变迁，国际秩序正随之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同时也是中国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重点，开启了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征程。于是，国人、世人看到，在中国周边烽火连片，狼烟四起，“C型”包围遏制的态势愈发明显。中国古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备战而不忘战，才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好保证。然而，多年来在太平盛世的幻象下，忘战、不敢言战的中国人比比皆是。而如今，领土纷争引发政治挑衅、军事对峙的愈发明显，中国的军事安全自然不容乐观。

经济安全最为严峻。在越开放越安全的观念指导下，中国在经济上陷入近乎全面的安全困境。首先，货币主权的弱化，成为中国经济不安全的滥觞。人民币发行主要不是依据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依据引进外资（美元）的数量来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不能购买本国财政债券，却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元，“支持”美国财政赤字。其次，无限引进外资，构成中国经济安全的持久之痛。因为外资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如此下去，中资永无出头之日。第三，外贸始终处于严重不等价交换地位，不仅是8亿件衬衫换1架空客的国际分工悬殊的悲哀，“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之咒，更主要的是我们拿真实的资源、优美的环境、劳动者的心血，换得的是没有任何实质价值的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

而且还把这种纸面财富交给美国使用，美国投资家、华尔街再以之来华投资继续盘剥中国。第四，环境、资源危机空前。中国不仅没有大量积累黄金，弱化货币主导权，而且丧失对黑金（石油）等能源的定价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宰割，对蓝金（水）等自然资源挥霍无度浪费严重，在白金（白云蓝天）等自然环境的损毁上触目惊心，由此对国民身体健康、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综合长效利用等产生持久不利影响。倘若有良好的资产评估师、会计师，能够对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总成本与总收益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核算，颠覆性结论能否出现也未可知。

社会安全不断恶化。社会是市场、政府的起源，决定着市场形态与政府结构。但是，市场往往与政府联合，不断挤压社会的发展空间。这种作为西方社会沉疴的不良迹象，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正是被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缺乏有效约束的政府双重挤压，中国社会出现了愈发严重的个人原子化、社群碎片化趋势，集体所有制、合作（伙）制等体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各种机制的生存日趋艰难。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持续泛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功能越发凸显——资源破坏、环境恶化、两极分化等市场劫难——恶魔般地缠绕着中国因 GDP 飙升而不断肥胖的身躯，使弱势一族承担了与其地位越来越不相称的成本，有名义增长而无实质发展的状况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由此不断加剧，群体性事件进入明显的高发、多发阶段。一些别有用心者乘机将“公民社会”等资产阶级价值理念兜售给不明就里的社会大众，导致社会大众出现饮鸩止渴似的精神疾患，仇官、仇警、仇政府等不良心态野草般在中华大地疯长，不仅直接威胁政府有效执政——政治安全，也威胁到市场有序运行——经济安全。

政治安全日趋突出。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的恶化，直接导致政权安全的严峻。多年来，中国战略重心一直安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之上，但是在国家战略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按经济增长业绩考核干部，以 GDP 论英雄，忽视了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设、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意识形态建设。更为严重的是，

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物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等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蔓延，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本质理念被不断模糊。一些人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反对一党执政。尤为甚者，这种乱象背后有境外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例如，香港非法“占中”事件特别值得警示。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日趋突出。

网络安全雪上加霜。当今，网络已成为主权国家必不可少的新空间、新媒体与新权力，成为个别国家维护霸权的新工具。网络虚拟空间越来越实，网络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地位与作用日益超越甚或取代传统媒体。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忽视了网络主权掌控与网络有效监管，忽视了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包括 IT 企业在内的网络主体的渗透与控制。以市场化（实质资本化）为主导的网络新媒体，其资本性远远超出党性、人民性，阶级属性超出国家民族属性。如此，某些中国网络媒体差不多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为跨国垄断资本服务，与境外敌对势力一唱一和，客观上站到了与国家民族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中国的网络空间近乎成为法外之地、无政府的新滥觞，成为少数“意见领袖”与资本实现知识力量与金钱力量交易的平台，成为敌对势力反党、反国家、反社会主义的工具。鉴于网络空间已内在成为军事、经济、社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都与网络密切相关，而混乱的网络秩序为日趋严峻的国家安全雪上加霜。

有鉴于此，国际“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游移，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笼罩了一层阴影；国内各种问题与风险的不断累积，使得矛盾凸显期愈发明显。内外负面因素相互影响，负能量不断叠加，给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的说明强调：“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已是当务之急。”^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国家战略部署的重大调整，突出显示安全的“软”道理正越来越“硬”。

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由于生存条件艰巨，中华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安全感。《周易》就告诫，“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只要王朝的统治者具有这种危机意识，时时如临深渊，处处如履薄冰，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就能出现太平盛世；反之，一旦统治者忘乎所以，直把杭州作汴州，把他乡当故乡，把乱世粉饰成盛世，不久就会有内部揭竿而起，外部强敌入侵，王朝灰飞烟灭。

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教训深刻揭示，中国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发展缓慢，停滞不前。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然而，以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经济依附、道德滑坡等等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同样是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主要的不安全因素。倘若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这些不安全因素，那么发展的成果便会化为乌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一再揭示：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不发展危险，不可持续的发展、无质量的发展同样危险，而不公平发展、两极分化的发展更加危险。后者正是先哲“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印证。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更加公平与均衡的发展，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发展，对于增进国家安全、改善国家治理，意义重大而深远。安全规定着发展的边线、底线与红线。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手段，但是发展的理念、战略、模式、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程度。就世界历史与当今国际现实来看，诸多国家出现的不安全状况——极端情形就是危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机——恰恰是不当的发展造成的、加剧的。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诸多亚非拉国家选择了以极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积极推行与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改革开放，由此不断积累风险而最终爆发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权危机乃至国家危机，一步一个脚印落入发展的泥淖，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泰国等诸多原本被国际组织看好或吹捧的“经济明星”由此一蹶不振。

市场机制具有不可避免的两重性，仅仅依靠市场发展，本身会带来安全问题。市场调节时常失灵，有很多的“死角”“盲点”和“鞭长莫及之处”。因此，市场机制本身有边线，不能无止境地扩张，不能放任自流，要“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相匹配，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协调。

市场导向思维，要把社会成员个个都变成精打细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个人原子化，社群碎片化，原本的命运共同体蜕变为利益共同体，有利就是合伙人，无利便是陌路人，利益冲突甚或变成了对手敌人。人、自然、货币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健康发展的基础。人、自然、货币不能市场化、不能商品化，这个原则是社会这个命运共同体存续与健康发展的底线。但是，市场的扩张，资本主导的市场把人变成了商品——劳动力可以买卖；自然变成了商品——土地可以兼并，环境被肆意破坏；货币也变成了商品——金融资本操控的央行把货币这个购买力变成了自己的禁商。

政府原本为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发展设置了红线——即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不可以交易，更不可跨国交易。但是，当今中国，早已成为经济人的一些中国精英无红线交易——出卖朋友、出卖团队甚至出卖国家都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

这些关乎市场、社会、政府三者科学定位、有利于国家治理的边线、底线与红线，都是在“发展”的名义下，实际也是在发展的实践中，被不当的发展而模糊、而穿越、而废弃。因此，仅有GDP的增长，不是发展；少数人少数地区少数行业的增长，不是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赢得的增长，不是发展；长期停留在国际分工低端的“低质量的增长”，不是发

展。发展，必须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实现代际公平发展，必须是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实现平衡发展，必须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是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与国家治理“五个现代化”实现全面发展。只有实现公平、平衡、均衡、全面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切实改善——不再会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小国敬畏、大国不敢造次，国家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中国风”享誉世界，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包括军事、经济、社会、政治、网络等在内的安全，才有切实可靠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明确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而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①，“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②很显然，发展与安全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对长期矛盾。在发展的“硬”道理越来越“软”的同时，安全的“软”道理正越来越“硬”。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矛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同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如此在理论战略与政策机制上确保发展与安全的平衡。有鉴于此，国家的繁荣与稳定、长治与久安是完全有理由值得期待的。

笔者多年致力于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的分析研究，深感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未能处理好“一手硬”与“一手软”的问题，中国的国家安全在发展中不断恶化，安全稳定与改革发展日趋失衡，由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出版了“国家经济安全”系列读本，引发广大读者关注，产生一定社会影响。但是，类似笔者这样的“不和谐声音”远不足以影响“一心一意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4年4月15日，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

谋赚钱”的发展导向。有道是“形势比人强”。相对于学者口干舌燥的呼吁，中国的国家安全严峻形势对大众的教育影响更为强烈。与当初相比，今天的国人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有了普遍提高，党和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维护给予高度重视，这必将有利于国家安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对于像笔者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本书中一些文章成稿发表较早，引用数字、遣词造句等留有旧日的烙印，虽然做了相应刷新，但是有的与上下文仍难以浑然一体，影响流畅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受笔者学识水准所限，一些文字段落可能直观表述有余，逻辑推理不足；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批评有余，建设不足；等等，诸多不是之处请读者海涵，笔者在今后的治学中将努力克服。

江涌

2014年12月